

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

谢秋山, 陈世香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 对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结构性梳理发现, 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是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 战略地位上, 文化从“边缘”变为“主流”; 功能定位上, 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提升为国家“软实力”; 管理思想上, 实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话语权力配置上, 从垄断性“国家话语”转换为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正是这种成功的文化政策转换, 促成了今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 公共治理; 文化政策; 公民话语; 制度变迁; 二元对立语境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4-0197-06

文化政策作为一种影响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有着物质资源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功能, 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在国家层面, 还是国际层面, 文化政策都正在成为政府政策制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1]。2007 年,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建设主题。此后,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指引方向, 特别是 2011 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更进一步提升为国家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 而文化政策则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推进文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就已有的文化政策建构来看,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 我国文化政策从无到有^[2],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但与此同时, 我国文化政策发展和建设还存在一些短板, 特别是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方面, 以及构建具有强大融合能力的主流文化方面存在着根本上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 60 多年来, 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总体趋势如何, 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应该走向何

方? 第二, 在过去 60 多年间, 我国的文化政策演变的背后推动力何在? 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予以爬梳和探讨, 以求教于同仁。

一、制度环境与个体行动者共同作用: 一个文化政策演变的理论框架

交易成本经济学为我们分析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总体框架, 即由宏观性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微观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和个体行动者(individual)所组成的层次性系统。首先, 文化政策作为一种由国家权力主导的、“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3}, 其发展和演变自然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特别是国内外政治、军事和安全状况的影响; 其次, 作为一类制度约束, 其必然与受其影响的社会行动者进行持续互动, 并相互构建, 从而发生渐进性的、持续性的变迁, 乃至激进型变革。此外, 从本质上看, 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 是一个社会统治阶层所极力推行的文化价值体系; 作为政治系统的文化思想, 必然为政治统治服务, 政治权力也必然嵌入到文化政策体系之内。换言之, “公共政策意味着通过政治的和集体的手段系统地追求某些目标”^{[4](39)}, 具有政治性, 统治者的意志必然会在民意的基础上得到体现。那么, 文化政策作

收稿日期: 2013-11-13; 修回日期: 2014-06-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and 运营中的财政保障标准与保障方式研究”(13ZD04); 湖北省软科学研究专项计划项目“中国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创新研究”(2011DHA012)

作者简介: 谢秋山(1981-), 男, 内蒙古赤峰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地方公共服务创新, 制度经济学; 陈世香(1973-), 男, 湖北鄂州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文化公共服务创新, 公共政策

为公共政策的属类,其必然是从国家的战略出发而制定的,特别是基于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识形态意义,决定了其比其它领域的公共政策都具有更强的政治性。

基于其政治性,与其它公共政策一样,文化政策的功能定位也随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出现转换;而伴随着指导思想定位的改变,国家具体的文化政策建构和执行过程中会出现新的变化。如管制的松动,而这种管理管制松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约束的松弛,会带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被约束个体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变化。如此,在政治意识形态约束和个体行动者选择的共同作用机制下,文化政策就发生了变迁,即文化政策演化是制度约束和个体行动者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文化政策建构主体的政治决策具有着关键性的中介作用,即政治意识形态的考量将决定着文化政策的走向,乃至个体行动者的选择,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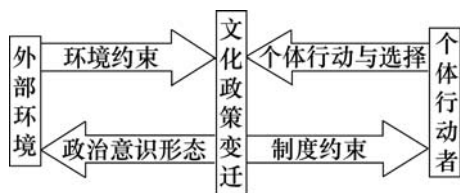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政策演变的层析架构^①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政策演变

作为对“冷战”格局的反应,以及基于路径依赖对中国自主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执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工作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其文化政策也是以贯彻和落实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根本宗旨。因此,其文化政策不可避免的带有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控制和价值引导的性质。但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逐步瓦解,以及我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执政党和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由国内外的政治军事斗争真正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放弃绝对的“二元对立语境”,“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了指导国家各方面建设发展的理论依据。而新世纪以来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为了应对国内新出现的诸多危机,国家逐步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上意识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十七大则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

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建设和文化政策构建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的转换。这种转换的过程展现了新中国文化自信和开放的态度,也构成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轨迹。

顺应政治意识形态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的转变,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文化政策在功能定位、战略地位、管理思想、政策话语权力配置等诸多方面都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着方向性的转变。

(一) 功能定位上,文化从“思想管控工具”提升为国家“软实力”

就文化政策的功能定位而言,从传统的“思想管控工具”提升为国家建设“软实力”是其基本演化轨迹。自从20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以来,“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共识,但“文化软实力”的铸就还需要公共政策的有力支持。适应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共存、传播、交融的需要,以及国家竞争向文化、社会制度等“软实力”领域转移的大环境背景,我国执政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要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为了便于识别文化政策功能定位演变的轨迹,我们总体上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特殊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和外交环境,这一时期国家文化政策的功能定位基本确定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导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实际上,在建国之初,各级政府很少就文化领域制定专门的公共政策,但国家非常重视文化的作用,在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都对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指导方针。这也就意味着,建国之初,我国文化领域政策工作主要由党中央直接负责,然后依靠政党领袖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强大政治动员能力,直接贯彻到基层、传播到广大群众中间。这些领导讲话和文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精神:第一,执政党创立之初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其文化也要贴近群众生活,鼓励群众文化发展,鼓励文化工作者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如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强调:“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群众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5]第二,为完成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目标,鼓励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宣传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路线。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就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

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6]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则明确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建立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二者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7]。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截然分明的、非此即彼,宣扬和贯彻马克思主义路线成为文化政策的核心任务。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至十七大以前的文化资本化阶段。鉴于中国积贫积弱、经济贫困的现状,改革开放的第一目标定位于促进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则在于市场经济改革。市场化改革迅速显示出其发展经济的巨大优越性,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更高水平的GDP就成为这一阶段整个国家战略,乃至整个社会的核心。文化建设相对而言成为一个次要的领域,成为一种辅助性社会资本,为经济建设提供支撑。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最早在韦伯那里就得到了阐述。在《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韦伯通过宗教文化比较研究,认为理性的宗教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制度主义更是把文化看做是一种资本,即文化能够“有效地转化劳动、资本、自然这些物质资源以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4](199)},促进经济的增长。当然,文化之于经济的功能绝非只有正向的影响,不良的亚文化也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成为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必须在文化政策制定中予以考虑。而社会的共同文化更是民族团结和社会融合的根本,是社会安稳定的基础,因为在宏观层面,共同文化有助于强化社会互动和减少社会冲突。在微观层面,共同文化则有助于降低社会交易风险和成本,进而支持劳动分工和促进市场交易繁荣。

基于上述的文化功能特性,文化政策的制定也必须通过考虑如何激励主流文化发展,以及把主流文化内化为广大公民的内心价值信仰,进而促进良好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形成,促进市场交易和社会互动,最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一阶段,非此即彼的完全二元对立语境开始逐渐松动,凡是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好的,文化的经济功能定位作为文化政策的重要功能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度认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认知,相对于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文化建设逐渐走向了相对边缘化状态。

第三阶段为党的十七大直至今天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在文化政策功能定位有了新的认识,文化政策功能从简单的思想意识控制的工具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剂,变为功能多样的、与经济、军事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并具有如下多方面的

功能。

一是满足公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功能。任何公共政策的首要而又最直接的功能都应该把着力点定位于广大公民的需要和需求,文化领域的公共政策功能定位也不例外。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个体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既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8]。其中生理需要更多是属于物质方面的需要,而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则主要都属于文化方面的需要。从这种需求层次的角度来考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的文化精神产品和服务需求就会显著增加,这就对文化公共政策提出了挑战。同时,根据经济学的研究,当人均GDP接近3 000美元的时候,居民文化娱乐消费需求会明显比重会迅速增长^[9]。但基于其公共产品的特性,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还需要通过文化政策的设计来引导供给增加,进而满足公民不断增长的文化产品需求。

二是宣扬民族主流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公民精神,提高公民文化素质的功能。政治和文化相辅相成,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是一个社会统治阶层所极力推行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政治系统的文化思想,必然为政治统治服务,所以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宣传政治系统所主张的主流文化必然成为文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也是公共文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是打造主流文化竞争力,应对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功能。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产品,而且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之一。为了应对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可能负面影响,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文化政策还需要推动国家主流文化发展和传播,用主流文化占领文化市场,用主流文化引领非主流文化,进而铸就良好的民主精神、优良的国民品格,推动民族崛起。

(二) 战略地位上,文化从“边缘”变为“主流”

建国60多年以来,我国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经历了多次转换升级,从中共十二大的“两位一体”、到十六大的“三位一体”、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四位一体”以及十八大的“五位一体”布局,与经济建设同步,文化建设始终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但与经济、政治和军事“硬实力”相比,文化对于增加国民收入的贡献能力较差,所以党的十七大以前,文化建设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状态,文化建设作为一种

象征符号,被各级政府束之高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随着国际竞争从“硬实力”向“软实力”领域的转变,国家在更深的层面上认识了文化的重要性,文化领域的公共政策也提到了更为重要的地位,真正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一起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这至少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证据来予以说明。

第一,文化政策出台的步伐加快。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党的十七大,随着国家对文化建设价值定位的不断提升,文化领域公共政策制定和出台的步伐也越来越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显示:从1978年到2002年的15年间,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只有37个,而2003年至2012年年底这10年间则多达466个^②。这些文化政策法规文件涉及新闻出版电影动漫、网络信息、文化遗产、产权保护、群众文化建设等各个行业和部门,初步建立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体系。

第二,文化政策制定从“碎片化”到“整体化”的演进。新中国成立之初,乃至到十七大以前,国家在文化领域的政策都是问题导向的“偶发行为”。但十七大以后国家开始系统性地加强文化建设和管理,所出台的文化政策涉及文化事业管理、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价值定位等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对新兴的互联网文化管理。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政策正在实现从最初的零碎性指导性方针到整体性文化政策体系的过渡,即正在实现从“碎片化”到“整体化”的演化。

第三,国家在文化建设上的财政投入持续增长。近年来,国家不断增加在文化建设上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入,2011年国家在文化体育与传媒方面的投入达到了1893.36亿元,而这一数字在2007年还仅为898.64亿元^③,四年间翻了一倍多。国家统计局从2007年开始,也把文化体育与传媒收支作为一项单独统计项目予以公示,而在2007年以前文化建设方面的公共财政收支都是列在社会文教费或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的项目之内。这些客观数字和事实都显示了国家真正地意识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从新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文化软实力建设。

(三) 管理思想上,实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年里,中国的文化政策本质上一直嵌套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下,处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语境”之下。执政党和政府一直严格控制着文化思想的发展方向,坚持着“马克思主义”方向,非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认为是非科学的、异化的,很少能得到“合法性身份”。但历史证明,执政党和政

府有能力面对国家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随着1978年国门的敞开,国家在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指导思想方面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启动了文化建设的市场化改革。如1987年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对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做出了规定,也代表着文化建设市场化取向的开端。而到了21世纪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执政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和文化政策构建有了新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政策开放自由的时代,只要是健康的文化都得到了政策层面的认可,具备合法化的身份。互联网文化自由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国家从政策层面依法对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和活动进行规范管理,但也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保护公民的参政议政和言论自由。这些都代表着我国的文化政策构建和文化建设正在由“统治”走向“治理”,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政策制定和文化建设的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市场化是为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服务改革的实践所证明的、一种能有效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而社会化则有助于缩减政府既有规模,预防行政权力对于私人权益的侵害。最为重要的是,市场化和社会化还有助于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到包括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实现参与主体多元化。

二是文化政策工具多样性。强制性较强的文化管制一直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政策工具的主体。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我国文化领域的政策工具逐渐趋于多样化,除文化管制政策外,财政方面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制度激励方面的文化创新奖励性政策和文化产权保护政策,以及产业化经营、非盈利组织和公民参与等市场化和社会化工具也逐渐增多。

(四) 政策话语权力配置上,从国家“垄断话语”转换为市场、国家和公民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

麦圭根(Jim McGuigan)受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影响,主张区分文化政策的三种话语结构(discursive formation),即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话语,“这三种话语都界定着‘真实的世界’,决定着动因和主体、生产者、消费者、市民和中介在文化领域的话语空间里所处的地位”^[10]。从其话语结构区分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乃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文化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等环节都是由国家话语所垄断,即执政党和政府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杆审查确定文化的合法性。

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化语逐渐凸显,文化建设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提上了日程。2000年,文化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文化产业单位要围绕市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政府积极鼓励和引导群众的文化消费”。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标志着市场话语的凸显。学者陈世香也认为这“标志着中央对于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变革内容与目标体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1]。

同时,公民话语也正在逐渐凸显,国家把群众性文化建设放在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2012年公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也强调要通过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村镇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依托重大节庆活动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但在文化政策制定领域,公民参与相对不足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未来进一步完善文化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

三、我国文化政策未来发展的思考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60多年里,中国文化政策在功能定位、战略地位、管理思想、话语权配置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正在实现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语境走向“多元和谐共存”语境,文化建设更贴近公民需要、更能适应世界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挑战。但对于达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建设目标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 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文化建设重要性的教育和宣传

实际上,文化建设不仅仅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竞争力,它还事关地区竞争力和地区发展,影响到投资者、旅游者和居住者的去留,这也正是世界各国先发地区的城市营销、地区营销都把文化建设摆在重要核心位置的关键原因所在。但受到长期的封建社会残留思想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官僚主义意识严重,加之长久积贫积弱造成的经济贫困使中国社会从下到上都具有严重的“唯GDP取向”,各级地方政府对文化等非直接生产性行业的战略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发展和供给体系建设并不重视。这就必须强化地方政府对于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地方政府官员真正从“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来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实现官员绩效

考核标准从“经济绩效”到“文化绩效”的转移,从思想教育和政治利益诱导两个方向来提高地方政府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二) 继续推进政府主体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不能否认文化政策的政治性,也就不能否认文化政策制定中的国家话语地位,但国家话语必须在充分吸纳市场话语和市民话语的基础之上,经过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反复过程才能实现理论和政策符合实际,更好地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制定出既符合人民群众的主流需要,又符合国家文化建设需要的公共政策。当前文化政策制定中的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过于强势,而市民话语严重不足。这种市民话语缺失所造成的主观盲目性,也正是当前国内公共文化资源供给结构性问题的关键原因所在。这种结构性问题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符合人民群众欣赏习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比较缺乏;二是大量没有真正需求、或百姓并不“喜闻乐见”的产品有所积压、造成极大的浪费^[12]。

(三) 加大公共财政对于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作为具有公共性的产品和服务,文化领域的政策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财政的转型和支持。但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支出预算结构也是以促进GDP增长为导向的,对于文化建设的投入相对不足,这极大地制约了文化政策体系创新的能力。财政投入不足也是导致文化政策执行和贯彻不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地方政府有意愿和规划来执行文化政策也会“有心无力”,这对于供给型文化政策的落实来说是瓶颈性的约束。而近年的市场化改革,也受到新经济自由主义影响,过度强调市场机制所带来的效率,而忽视了文化政策所本应具有的价值导向和服务均等功能。

(四) 加强文化政策制定和执行领域的科学性论证

任何公共政策只有得到良好的执行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才能起到应有的预期功能。但基于有效行政问责机制缺乏、财政投入相对不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行政人员对于文化政策贯彻落实的积极性不高,以至于执行阻滞较多,政策往往流于形式、实效较差,“政策空传”现象屡屡发生。此外,文化政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文化政策标的物“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制度约束,而且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以作为正式制度约束的文化政策去影响和引导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的文化将面临更多的约束和挑战,特别是将面临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制度总是一个‘混合袋子’(mixed

bag), 在其中, 既有促使生产能力提高的因素, 也有降低生产能力的因素”^{[3](11)}, 文化政策科学与否对于文化建设的成效是至关重要的。有鉴于此, 必须要加强文化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科学论证, 预防事后补救型文化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注释:

- ① 该框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 Williamson 治理框架的参考, 详细参见 Oliver E. Williamson 所著的、1996 年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The Mechanism of Governance》, 第 326 页。
- ② 相关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http://zwgk.mcprc.gov.cn/?classInfold=748>)公布的政策法规计算得出。
- ③ 相关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2012》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8》。

参考文献:

- [1] Victor A. Ginsburgh and David Throsby [C]// Elsevier B V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Culture* (Vol.1).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006: 17.
- [2] 李少惠, 张红娟. 建国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发展[J]. 社会主义研究, 2010(2): 110-114.
- [3] 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4] 柯武刚, 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M]. 毛泽东文艺论文集,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111.
- [6] 毛泽东.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318.
- [7]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695.
- [8] Abraham Harold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 50(4): 370-396.
- [9] 李萍, 夏沁芳, 刘黎. 人均 GDP3000 美元后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 2003(3): 56-61.
- [10] 麦圭根. 重新思考文化政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47.
- [11] 陈世香. 大部制视角下地方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变革进程及其挑战[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5): 38-48.
- [12] 巫志南. 公共文化资源供给的主体、方式、渠道和机制研究 [C]// 于群, 李国新.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12).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49-50.

Change process and prospect of China's cultural policy

XIE Qiushan, CHEN Shixiang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e paper mainly lists and sorts out systematically the trend of cultural polic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he finding is that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nation dominating, dichotomous thought” to “harmonious coexist of multiculturalism” is the basic 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policy change process in China: from ramification to mainstream in strategic position, change from the tool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to national soft power in functional position and from domination to governance in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from monopolistic national discourse to national integrated discourse, in power allocation, which consist of the voice of nation, market and civil society. The paper also expounds why China's in power allocation cultural policy brings today's good start of the Grea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public governance; cultural policy; civil discourse; institutional change; dichotomous thought

[编辑: 颜关明]